

蜀文化:

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

○ 陈世松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传统。应该怎样来概括这一传统文化内
涵呢？“巴蜀文化”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
最为普及流行。然而，近十多年来才被人们
认识的“蜀文化”的概念，极可能改变这一
传统看法。本文拟从考古文化、地域文化和
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
在四川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一番考察。

一、考古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的概念，虽然早在 50 年代就
曾被老一辈的史学家提到过^①，但从考古学
上较为系统地论述蜀文化，则是最近十多年
的事。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文化，比巴蜀文
化更晚一些才被人们发现。可以说，人们正
是通过探讨巴蜀文化才接触到蜀文化的。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文化是人们认识

蜀文化的先导。

“巴蜀文化”的命名，是从抗日战争时期
卫聚贤在一篇题为《巴蜀文化》的文章中^② 首
先提出来的。此后，凡是四川出土的古代器
物而带地方特色者，均以“巴蜀文化”称之。
但当时所说的巴蜀文化，还不是一种科学的
考古文化。使巴蜀文化变成成为一种科学的考
古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1973 年，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指出：“现
在四川所发现的原始社会的遗物，尚未有能
与巴、蜀相连者，所以我们以考古学上所称
的巴蜀文化，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③

80 年代以来四川考古工作的巨大收获之一，
是初步建立起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
列。而四五十年代人们所讲的巴蜀文化，时
代大致限于春秋战国。现在所讲的巴蜀文化，
下限应定在西汉前期，“到汉武帝以后，统一
的汉文化占了主要地位，巴蜀文化作为一种

① 如 50 年代，徐中舒在《巴蜀文化初论》、蒙文通在《巴蜀史的问题》中，均曾从文献角度论及过“蜀文化”。分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页 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页 78-7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② 卫聚贤文分载于《说文月刊》三卷四期（1941 年）和三卷七期（1942 年）。

③ 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原载《历史知识》1980 年 4 期，见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页 138-140，文物出版社，1987 年。

考古学文化基本结束了。”^①

那么,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源于何方?是四川本土创造的,还是外来的?这个问题,直到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与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分布于成都平原的数十处古遗址(著名的如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抚琴小区、指挥街、岷山饭店等遗址)的发现,再加上1995—1996年,在成都市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郫县三道堰、崇州双河发现的五座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②,才为上溯四川文化的渊源——蜀文化带来了希望。

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分析,人们终于识到:蜀文化不仅是一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更是一种年代久远、源远流长的古文化。为了把它与巴蜀文化相区别,学者们专门赋予它以“古蜀文化”、“早期蜀文化”,或“早蜀文化”、“先蜀文化”等称号。如果把这种蜀文化依照其产生形成的顺序,而不是按发现先后来表述,其发展过程和内涵特征可简要概述如下: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③。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

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④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三星堆遗址同时还显示了进入文明社会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有学者推测三星堆遗址可能是早期的蜀都,是三千多年前蜀国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的中心^⑤。

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面貌,是属于同一蜀文化系统的考古文化。成都市内十二桥等遗址,也是具有蜀文化特征的典型。它们在文化面貌上互有叠合、承继并各有侧重,又勾勒出成都市商周时期文化发展的轮廓^⑥。

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曾经笔录过一则长期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历史文化起源的传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历夏、商、周。”^⑦在近代疑古思潮中,这类传说曾被视为“无稽之谈”而受到抨击。现在,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蜀文化经历过夏、商、周的客观存在,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新见证又不断涌现出来,那么,把作为四川文化源头的蜀文化的起源时间,再大胆地向前推进一步,应该是很有希望的。所以,现在已有学者预言:“蜀文化很可能会起源于5000以前,甚至‘肇于人皇’,殊未可知。”^⑧

① 参见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7年10期;《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化·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页1—9。

② 参见《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

③ 江章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与史前文化》,《寻根》1997年4期;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4期。

④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⑤ 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4期。

⑥ 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载《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页295—309。

⑦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1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⑧ 李学勤:《蜀文化神秘面纱的揭开》,《寻根》1997年4期。

二、地域文化上的蜀文化

近十多年来发现的典型蜀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大多集中在成都平原。其中尤以广汉、成都这两座并存的“双子星座”式的商代巨大城邑最为瞩目。它进一步证明成都平原不仅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更是长江文明，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四川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和它在古代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古蜀文化区的生态环境与地理位置究竟怎样？它如何适合初期文明的发生？对蜀文化特质的形成有何影响？林向教授对这些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一）这里物质丰裕，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为古代各种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这里地势有利于初期文明社会的安定过渡和发展。（三）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古代交通。（四）这里的山间、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坝子，成都平原便是其中面积最大（达 7337 平方公里）的坝子，由此形成为“坝子文化”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①。

关于古蜀人的来历，和任何区域的人口成分一样，比较复杂，涉及一个土著和外来移民区分的问题。人们把最先从西面岷山下来，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氏、羌系统的民族，视为早期蜀族的祖先。相对于后来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又同成都平原的原有居民一道，构成了本地的土著。此外，还涉及一个统治层与本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的区别问题。毫无疑问，“蜀地的人们共同体的基

本成分本是当地土著”，与统治者有所区别^②。由于在蜀国历史中，又有溯江而上的濮越、荆楚系统的民族，加入到蜀国的统治层中去。相对于秦、汉以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也应该视为蜀国的先民。这样，先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以及在蜀国疆域内生活的居民，经过长期融合，便共同构成了蜀文化的创造者——蜀人。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表明，“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③古蜀文明也正是按照这一通例，经由先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共同制造出来的又一件“百衲衣”。在古代成都平原从文明孕育到成长壮大，直至产生有如三星堆文化那样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周边的外来文化。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④古蜀文化区不仅与北面的中原夏、商、周、秦文化有联系，而且同东面史前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后来的楚文化，南面的濮、越文化有关系。正是得此地利和天时之便，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像“一座大水库”一样，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成为各种文化的荟萃杂交之地。可以说，早期蜀文化就是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文化杂交”工程的结晶。

在早期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成都平原之所以较早地成为凝聚人们文化共同体的中心，绝非偶然。这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因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号

① 林向：《巴蜀文化新论》，页 15—19，成都出版社，1995年；《古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寻根》，1997年 4期。

② 孙 华：《巴蜀文化杂记》，《文物》1989年 5期。

③ 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序，页 3，三联书店，1984年。

④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页 1

令蜀地的政治中心。由于古代成都平原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这里自然便成为人们聚居生存的理想之区。早在氏族社会鼎盛的时期,居住在成都平原的蜀人,便充分适应平原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利用平原特有的分散的聚落形态,在一个个平原小坝子上,缔造了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古代巴蜀境内有多达百数十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①。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戎伯文化”的集合体。另据传说记载,四川古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以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为代表的早期蜀王国,以及相继由杜宇和鳖灵建立的杜宇王国和开明王国。这些蜀王大多以成都这个大坝子为大本营,号令四周小坝子,乃至更远范围的小诸侯。如号称望帝的杜宇,先定都汶山下,后又以郫(今成都郫县)为都邑,别治瞿上(今成都双流县境),号称丛帝的鳖灵,原治青衣江会(今乐山),建立开明王朝后,也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后迁成都。正因为在成都平原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以戎伯首领和王权为支撑的政治核心,带动这些小坝子上的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的氏族部落,这才促进了古蜀文明的发生、发展与传播,并最终形成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域。

另一方面,因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还是主导蜀地的经济中心。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当人们在运用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从事经济开发活动的同时,文化便随之悄然降临。由于成都平原具有天然良好的生存空间,

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各族人民前来此区进行开发,因此这里往往成为各种先进技艺交流荟萃的场所,主导蜀地的经济中心。蒙文通先生精辟地论述了蜀的经济文化同步转移过程,他指出,蜀文化最先是从岷江河谷发祥的,“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因为,早期蜀族——氏羌民族“从岷山下居低湿地区,可能先在青衣、临邛一道河谷里。若成都平原,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须在农业发展时才能显得重要,是不难想象的。”^②其后,“教民务农”的杜宇,正是通过江源、临邛这一河谷,把农业引入成都平原的。取代杜宇的开明王,也是从南面沿岷江北上,最后才到成都的。先后从周边其它文化区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带来了各自的技艺和习俗。其中,尤以杜宇、开明带来的治水技术和农田开发技术,对解决长期困扰成都平原的水患,充分发挥地利优势,实现由山麓农业向平原农业的飞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之所以最终执掌蜀王权,并确立起在文化综合体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把握了推进成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定的时空构架组成的。它不仅有成都平原这个圆心,也还有其相应的范围和边缘。有学者表述蜀文化的影响范围如下:“新石器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分布在西起汉源雅安,东到宜昌地区,北到绵阳,南到长江沿岸这样一个东西狭长的区域内。青铜时代晚期(商周时期)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西起汉源,东到长江三峡两岸,向北发展到陕西汉中、宝鸡等一个南北较长的地区,汉中城固、宝鸡茹家庄等铜器群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③林向把蜀文化圈的构

①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页27-35

②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页79

③ 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7年10期。

成概述为一个“中心”、四个“板块”，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类型）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岷江上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①。这个范围，与《华阳国志》所载蜀的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眉”^②，大体相符，也正与《汉书·地理志》所说“与巴蜀同俗”的区域相当。

古蜀文化区范围的大小，及其所含蜀文化因素的多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是有所差别的。这一切都随古蜀文化区的时空轴的移动而发生改变。例如，在古蜀文化区的时间轴线上，不同时期文化区域的盈缩，影响力的大小，往往是同氏族部落文化综合体的盛衰，以及蜀王权的兴替和蜀王国国势的强弱密切相关的。而在古蜀文化区的空间轴线上，不同地区所含蜀文化的多少，往往又与其距离古蜀文化区的中心——成都平原的远近有关系。可以说，蜀文化圈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传播现象，是以成都平原为圆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多少，是和该遗存和成都平原的距离成正比，即越近越强烈，越远越薄弱，呈现蜀文化向外传布的波圈现象”^③。这不仅是史前时期，而且也是历史时期蜀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三、传统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2500年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

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④。

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首先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传承的渠道是否通畅。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汉以来引入的汉文化，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所以，在经过这两度涵化以后，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依旧，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

下面，略举数端，着重说明蜀文化在秦汉以后如何显示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

（一）蜀文化治水 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之后，古蜀文明虽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

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⑤。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高潮。“凿离

① 谭继和：《巴蜀文化新论·跋》，见林向《巴蜀文化新论》，页277

②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113

③ 林向：《巴蜀文化新论》，页8

④ 许倬云：《历史的分光镜》，《读书》1997年10期

⑤ 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页11

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① 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②。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③ 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时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④。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二）天下名都——蜀都形象的树立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巴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进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簿（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⑤。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歌咏成都，晋人左思继作《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⑥。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三）蜀地精神文化的飞跃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

① 《史记》卷 29《河渠书》

②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页 73

③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 113

④ 袁庭栋：《巴蜀文化》，页 3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⑤ 谭继和：《成都城市文化的性质及其特征》，载《成都城市研究》，页 341—342，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⑥ 左思：《蜀都赋》，《文选》卷 4

然相异。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①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经学、律令，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的学术文化引进蜀地。

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学，长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深厚关系。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②。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③《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④誉之。

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原本指儒

学传播之意，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广泛的认同。再经过发展演变，最后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凡是蜀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名扬天下，与王安石的“新学”相对，与“洛学”、“朔学”相抗衡^⑤。正因为蜀文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神的旗帜，所以，在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蜀学”牌，给蜀学注入时代新意，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以宣传变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写的《议蜀学》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重整蜀学”的口号和设想^⑥。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泛流传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四）蜀人生活方式的塑造

《华阳国志》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作了简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汉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蜀人在衣冠、嫁娶、丧葬等各个方面，开始向奢侈看齐。“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典而羊豕夕牲，赠_襚兼加，_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

① 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志》，《文选》卷4

②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页97

③ 《汉书》卷89《文翁传》

④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146

⑤ 参见胡昭曦等：《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

⑥ 蒙文通：《议蜀学》，载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

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①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蜀人养成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互相作用的结果。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著称。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巴蜀人歌舞娱乐，主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神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丰盛以后，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很容易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丰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先进完善，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为滋生奢靡风俗的土壤。对此，《汉书》作者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②大抵时代不同，俗亦微异。然其人易于满足，追求享受，“溺于逸乐”的习性和传统，则古今同然。

(五) 信仰方式的传承

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都变成了神仙，其民亦随王变成了仙。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不同，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当时蜀人对自然、神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天、地、山、河的崇拜，并

且有了巫术思想。战国时，道家思想传进巴蜀，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讲灾祥、律历、占卜和神仙学的学派。西汉时，成都人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影响及于东汉，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在其《想尔注》中，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指归》的思想，把《老子》一书从人学变成为神学，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滥觞于蜀地，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联绵不断，一脉相承，纵贯古今，而且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长的蜀文化，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逐渐凝聚成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代历史上，经常可以发现启用“蜀”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论宣传的现象，如三国时刘备的“蜀汉”政权、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宋初李顺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独立后建立的“蜀军政府”等。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凡此足以证明，源远流长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一面振奋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世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邮政编码 610071

(责任编辑 段渝)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 113、148

② 《汉书》卷 28《地理志》。